

## 【读书笔记】“反宗教改革”简史



龙草

有机化学话题下的优秀答主

“反宗教改革（counter-reformation）”的意思并不是“反对宗教改革”，而是天主教会在面临教改运动中蓬勃发展的反对教廷权威的新教派别，自己开展对旧教廷体制和政策的改革以对抗新教影响的运动。所以虽然名字叫“反宗教改革”，却并不是“反对改革”，而是“反动改革”，是以强化教廷权威、对抗新教影响为目的的“改革”。

读近代欧洲史的一个常见误区就是认为天主教廷在宗教改革运动中完全就是被动等死，看着新教势力不断壮大，然后不得不发动军事镇压。但实际上，天主教会中一些不满当时教会腐化堕落但也不认可新教这种完全砸烂教廷权威的一部分修士，自教改运动爆发伊始就开始了一系列的对教廷旧体制的改革运动，得到了罗马教廷的支持，并且和支持教廷的封建主的军事、政治迫害联手，成功扭转了多个地区的新教化趋势，这就是所谓“反宗教改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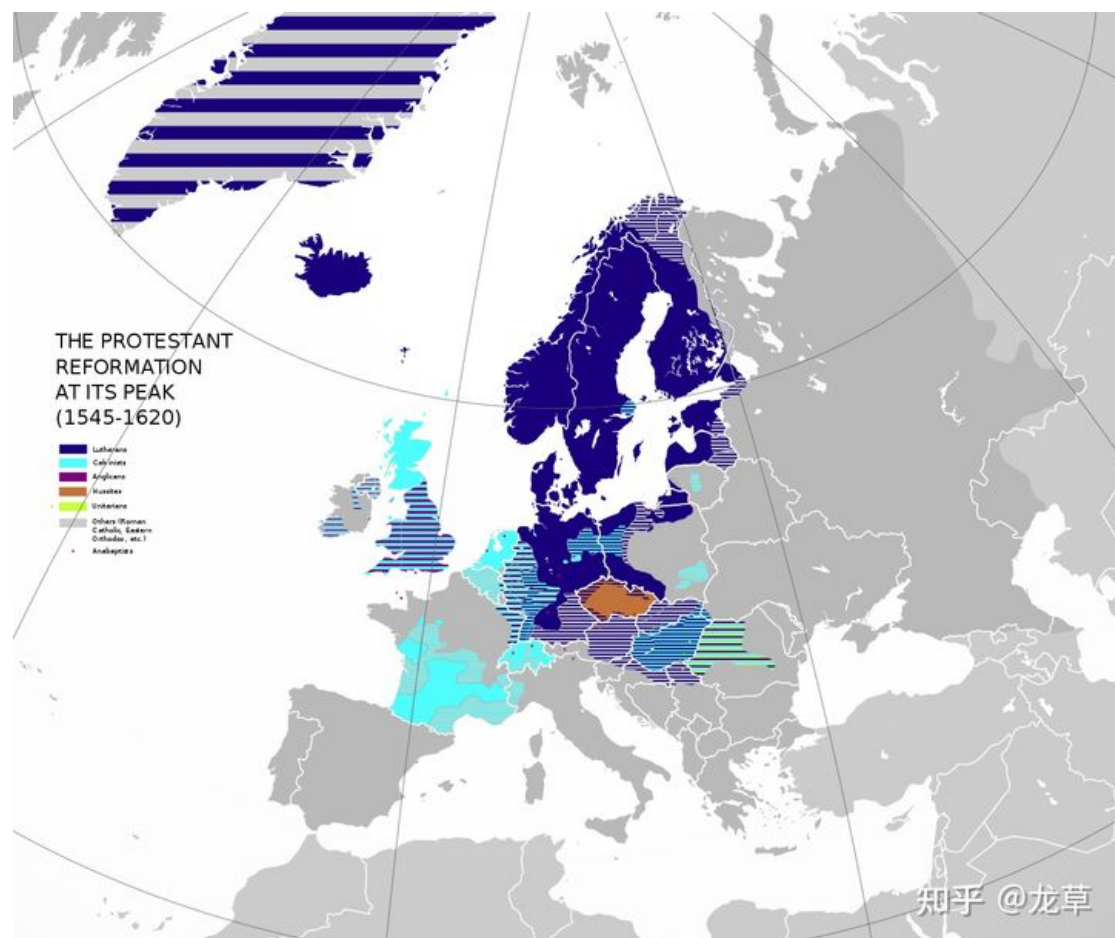
“反宗教改革”运动在中文互联网上提及较少，似乎很多人都认为教改运动爆发后一直就是新教越来越强势、教廷越来越弱势——但实际上不是的，从更长远的历史来看，教改运动真正获得完全成功的地区就是北欧和北德意志；而如波兰、匈牙利、法国等地，在16世纪中期都表现出了一定新教倾向，但最终都被各国君主和教会推行的反宗教改革压制，重新变成天主教占绝对主导的国家。从整体来看，反宗教改革对教改运动后的世界格局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产生的余波甚至一直持续到19世纪。

### 天主教的危机和教改运动的发展

严格来说，16世纪初的教改运动并不是天主教第一次面对严重的内部危机。中世纪盛期法国南部的清洁派异端动荡以及中世纪晚期的胡斯战争都反映出了天主教本身存在着严重的矛盾。自1209年清洁派圣战到胡斯战争，大规模的针对天主教内部所谓“异端”的十字军就至少有八次（1209年清洁派十字军，1228年低地德伦特十字军，1233年斯德丁十字军，1235年波斯尼亚十字军，1284年西西里晚祷战争，1340年波西米亚瓦勒度派和清洁派十字军，1382年法国德宾塞十字军，1419年胡斯战争）——这其中并不都是真的对抗教义上的“异端”，很多实际上是教廷参与政治斗争并给政敌扣“异端”的帽子引发的十字军。

但是事后诸葛亮的分析，16世纪的危机面临着很多新的问题：经济上，地理大发现推动工商业的蓬勃发展造就了新的社会阶层，这批人要求分享传统由贵族和教会把持的政治经济权利；文化上，1453年东罗马帝国灭亡使得大量希腊的教士和学者把希腊的古籍和经典带到西欧，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希腊文原文《圣经》，加上印刷术的出现大大降低了普通人接触圣经的门槛，稀释了教廷对圣经做出独家解释的权威；政治上，1444年瓦尔纳之战和1453年东罗马帝国灭亡基本宣告了十字军东征的失败，教廷无法再通过许诺战利品来缓和与世俗领主之间的矛盾，

而积极参加世俗政治事务的教会很难再在贵族面前保持神秘感。这些问题都使 16 世纪天主教的危机并不像过去如胡斯战争那样局限在某个有独特经济文化特点的地区，而呈现出一种广泛的、普遍的危机形态。



教改运动鼎盛时期天主教世界的新教化大致范围

1517 年，教廷为了建造圣彼得大教堂，开始大规模发行新一批的赎罪券。这次赎罪券和以往的不太一样，是一种“重置性”的赎罪券。过去的赎罪券往往只能赎买一定年限的炼狱刑罚，而 1517 年赎罪券主要是“完全大赦”性质的，也就是说一个人买了这种赎罪券即能直接重置其一生中犯下的所有罪恶，恢复到刚出生的状态，这种性质的赎罪券啊在过去并不是没有，但是非常罕见。但是 1517 年的赎罪券发行则以这种重置赎罪券为主，教廷还派遣大批营销地推人员到各地宣传，声势非常浩大。1517 年 10 月 31 日，马丁路德发表了《九十五条论纲》。马丁路德一开始依然试图把这次辩论局限在教会中，所以《九十五条论纲》原文是由拉丁文写成并张贴，然后致信在北德出售赎罪券的美因茨大主教勃兰登堡的阿尔伯特。但后来菲利普·梅兰希通提到这篇论文被张贴在了诸圣教堂门口。但具体的过程已经不太重要，在 1517 年 10 月之后的一段时间，维滕贝格的教士和精英阶层都听说了这篇论文。早期对《九十五条论纲》的分发依然局限在教会内部，以拉丁文的形式传播；而后来卡斯帕·内策尔则主导将其翻译成了德语，并分发给了一些德意志其他地区的团体，这使得这篇论文开始在德意志地区广泛传播。

后世人们认为《九十五条论纲》开启了宗教改革运动，同时，一大批新的改革家也不断站上历史舞台：托马斯·闵采尔、安德烈·卡尔施塔特、马丁·布策尔、

约翰内斯·布伦茨、乌尔里希·慈运理、尼古拉斯·冯·阿姆斯多夫、乌尔里希·冯·胡腾等人在德意志各地发动了针对教廷权威的反抗运动。但是 1517 年之后的几年中，包括海德堡辩论和莱比锡辩论，这场运动依然局限在少数教士团体和精英阶层中。随着《九十五条论纲》的广泛传播，1520 年教宗利奥十世要求路德撤回论文中的四十一条以及其它批判教会的著作。1521 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在沃尔姆斯召见路德，这是教改运动从单纯的教会争论转变成政治问题的关键事件。沃尔姆斯会议上马丁路德拒绝撤回自己大部分著作，除了对一些人身攻击而道歉外，还与皇帝的特使约翰·埃克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论战。到 1522 年，由路德、梅兰希通、伊拉斯谟等人从希伯来语和希腊语《圣经》直接翻译成德语的《路德圣经》的新约部分出版；1525 年普鲁士大公改宗新教，成为第一个正式官方改宗新教的政权。

1524 年，受教会和封建贵族双重压迫的德意志市民和农民阶层被宗教改革思想启发，德意志农民战争爆发，但很快被镇压，支持起义的闵采尔在 1525 年被俘后被斩首。但此时，路德依然坚持认为，他所追求的改革是教会的改革，而不是如闵采尔或者之前的萨弗纳罗拉等人设想的社会改革。路德在瓦恩斯贝尔格血案后严厉批判起义军，说他们应该“被砸死、被赐死、不管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就像打死疯狗一样”。

1530 年 6 月，奥格斯堡议会上路德和梅兰希通向查理五世陈述了《奥格斯堡信条》，奠定了路德宗的教义基础。当年 8 月，神圣罗马帝国的教会发布《对奥格斯堡信条的反驳》，明确拒绝奥格斯堡信条。此后十几年，新教在北德意志和北欧地区这些教廷权威延申的末端飞速传播，并且开始影响传统意义上教廷和哈布斯堡王室统治的核心地区——奥地利和北意大利。尤其奥地利，由于语言相通，亦受到北德意志教改运动一定程度的影响，这使哈布斯堡王室产生了严重的危机感。

但是这场危机依然有地理分布上的不均衡性——表现出的形态就是地理上远离教廷统治的核心地区的欧洲北部，北德意志、北欧、低地和英国，处在天主教世界的边缘地带，能够从教廷权威中分享的利益较少，其教改运动蓬勃发展，甚至得到了一部分贵族阶层的支持：如瑞典、英格兰，是统治者亲自支持和推动宗教改革。而靠近教廷统治核心、能够分享教廷权威的利益的南欧地区，如西班牙、葡萄牙、奥地利教改运动则相对弱势。欧洲中部，法国、南德意志、捷克、波兰和匈牙利成为改革派和天主教廷争夺的焦点，这些地区的教改运动都出现了反复，也是后来“反宗教改革”影响最大的几个地区——从结果来看，到 19 世纪初，法国、南德意志、捷克、波兰和匈牙利最终都成功抵抗了新教化，成为天主教占主导的地区。

## 耶稣会的崛起

1491 年，一个名叫伊尼哥·洛佩兹·德·罗耀拉的西班牙巴斯克贵族出生。1521 年，罗耀拉作为一个军人参与了潘普洛纳保卫战，在此战中他身负重伤，腿部残疾无法再继续当兵。于是在养伤期间，他阅读了大量天主教作品和圣徒列传，天主教狂热开始在其心中生根发芽。此时正值北德意志教改运动发展的初期，而因战伤残疾的罗耀拉因为苦闷，产生了很多幻觉，并且声称自己见到了异象。1534 年 8 月 15 日，在法国留学的罗耀拉和另外六位同仁（包括后来著名的圣方济

各·沙勿略）在巴黎蒙马特的圣彼得教堂宣誓他们毕生都会服饰主的工作，随后查理五世的重要谋臣、波吉亚家族的弗朗西斯·波吉亚也加入了他们。

1534 年，教宗保禄三世上台。保禄三世是一位铁腕的教宗，也是第一个尝试与新教正面对抗的教宗。1536 年，保禄三世召集了一批以虔诚著称的著名主教，组成了一个委员会，开始讨论如何改革现有天主教体制以应对新教运动。1537 年，这个委员会发布了《*Consilium de Emendanda Ecclesia*》，严厉抨击了当时教廷和地方教会滥用职权、腐化堕落的现状，并要求立即废除这些行为。保禄三世认为，查理五世可能对教会改革没有多大兴趣，哈布斯堡王室在意的是能否继续从教会权威中获得好处，而保禄三世认为要想使天主教廷存在下去，改革几乎是必须的。但是新教徒认为这些所谓的改革就是隔靴搔痒。1538 年马丁路德出版了一个讽刺性的漫画，漫画中红衣主教们用狗尾草而不是扫帚打扫教堂的马厩，以讥讽这些所谓的改革动议就像狗尾草一样没有意义。实际上也确实，这些动议并没有达成真正的改革，只是停留在了动议程度。

16 世纪初的英格兰的清教徒正在搞轰轰烈烈的圣像破坏运动，清教徒们拆除了坎特伯雷的圣托马斯贝克特神龛，直接导致了保禄三世一怒之下将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开除教籍。亨利八世本来和教廷的关系就因为之前的教宗在哈布斯堡王室的影响下拒绝他和阿拉贡的凯瑟琳离婚而降到了冰点，这次开除教籍本质上就是教廷这边确认了一下这个事实——自此，英格兰教会几乎彻底脱离罗马教廷节制。

1539 年，彼得·法布尔，弗朗西斯·哈维尔和罗耀拉正式成立了耶稣会，并在 1540 年得到教宗的认可。罗耀拉成为耶稣会的第一任“大将军”，或者总会长（superior general）。由于罗耀拉本身是军人出身，耶稣会的组织结构和过去的非军事修会有很大的差别，带有很强的军事色彩，但并不真正从事战争。耶稣会士除了要过禁欲和清贫的生活外，还要宣誓绝对服从教宗。耶稣会的最高权力是总会长，其他的所有领袖都由总会长直接任命，而总会长则是终身任职。

耶稣会的核心任务就是尽一切努力，对抗新教的影响，扩大天主教会的影响力。其手段分为两种：第一，大力投资和发展教育，开设学校，垄断年轻人的信仰通道。耶稣会认为“给我一个孩子，让我们教育他到七岁，他会终生做天主教徒”；第二，在欧洲之外推广天主教。耶稣会士在 16-17 世纪几乎遍布了当时人类所能达到的所有陆地：美洲、非洲和亚洲的天主教徒多半来自耶稣会士的传教，耶稣会在当地传教不拘泥于传统的欧洲天主教文化，而是尝试将天主教义和当地文化传统结合起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尤其是沙勿略在印度、东南亚和日本，利玛窦在中国都取得了卓越的成果。

但不要因此认为耶稣会非常“开明”。相反，耶稣会认为除了尊崇罗马天主教廷之外的都是异端。其手段也非常凌厉，极具军事现实主义色彩，甚至很多耶稣会士认为为了维护教廷权威可以不择手段，和过去人们印象中的腐化、堕落、教条和惰性的教廷和多明我会、方济各会等等形成了鲜明对比。耶稣会的手段也成为了后世反宗教改革的学习对象。

## 罗马异端审判庭

但是单纯通过传教和讲学这种手段是不够的，因为这些东西新教也会，也很容易推广。但是有一个东西，当时的一部分新教派别还用的不太熟练，那就是宗教裁判所，或者叫异端审判庭。

宗教裁判所不是教改运动后才有的东西。在宗教裁判所成立之前，教会针对异端的策略是先由主教调查，并且交给世俗法庭裁断。1179 年第三次拉特兰大公会议上将这个手段立法，并成为针对清洁派十字军的法理依据。1184 年，针对清洁派的临时异端审判庭在朗格多克成立，处决了一大批清洁派信徒。1229 年清洁派十字军结束后，宗教裁判所被确立为永久的制度，并且主要由多明我会来维持运作。

1478 年，随着再征服运动进入尾声，伊莎贝拉女王和斐迪南国王申请成立西班牙异端审判庭，来从改宗天主教的犹太人和穆斯林中识别异端。多明我会的修士托马斯·德·托尔克玛达是西班牙异端审判庭的首任大法官，其在位期间，首任女王和国王发布阿尔罕布拉诏书驱逐犹太人——就很神奇，阿尔罕布拉宫可是穆斯林留下来的建筑。在阿尔罕布拉诏书发布后，将近 20 万犹太人被迫改宗天主教，这个诏书到 1968 年才被正式撤销。自 1480 年到 1530 年，在西班牙异端审判庭下处以火刑的就有数千人。1834 年伊莎贝拉二世统治期间，西班牙异端审判庭才被正式废除。

西班牙异端审判庭的效果是很显著的。被穆斯林统治大部分地区数百年，西班牙却在 15 世纪-16 世纪一跃成为天主教狂热最强烈的国家，查理五世更是自命天主教的保护者，1527 年教宗有一点不听查理五世的话，查理五世就直接攻占罗马。整个伊比利亚半岛在教改运动中更是一枝独秀，几乎没有让新教产生多少实际的影响。

1542 年，保禄三世正式在罗马设立异端审判庭，开始压制和迫害新教徒，但是很快异端审判庭的执法范围就扩大到了针对一切可能威胁到罗马教廷权威的思想。1543 年，哥白尼发表《天体运行论》，并献给以热爱天文学著称的教宗保禄三世。但是到很多年后的 1616 年，异端审判庭宣布《天体运行论》的观点是“哲学上的愚蠢和荒谬”，是所谓“形式上的异端”，或者至少“在信仰上是错误的”。1633 年，继承和发展哥白尼理论的伽利略被罗马异端审判庭审判，被认为“强烈怀疑是异端”，他的著作《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也被列入禁书目录，其本人之后也被软禁至死。当然最惨的还是布鲁诺，1592 年被告发，随后被异端审判庭宣判为异端，最后与 1600 年 2 月 17 日在罗马鲜花广场被烧死，他的所有著作也被列入禁书目录。

总体上，罗马异端审判庭的影响是很坏的，尽管整体上没有西班牙异端审判庭那么血腥，但是因为罗马处于天主教世界的中心地位，其审判的很多对象都有极大的影响力和极高的历史地位，留下了非常恶劣的历史影响：不仅是哥白尼、伽利略、布鲁诺，还有意大利哲学家托马索·坎帕雷拉、吉罗拉莫·卡尔达诺以及切萨雷·克雷默尼尼等人，都遭到过罗马异端审判庭的迫害。某些新教教派在教改运动中也有样学样，也动辄祭出烧人大法来打击论敌。当双方都开始采用人身毁灭的手段来对付论敌时，教改运动就已经不仅仅是一场宗教上或者文化上的运动了，其之后的发展也进入了更加血腥暴力的篇章。

## 特利腾大公会议

1545 年，为了应对教改运动的发展，天主教廷在北意大利的特伦托召开大公会议，史称特利腾大公会议。特利腾大公会议宣告着反宗教改革运动的全面开展。过去反宗教改革是局限在教宗和耶稣会等少数团体，而特利腾大公会议则是教宗对整个天主教世界发起了总动员，要求整个天主教世界开始统一步调对抗新教的发展，捍卫教廷的权威。

特利腾大公会议 1545 年开始，1563 年结束，总共召开了三轮。意大利、西班牙、德意志和法国的教士前来参加，而意大利的代表比其他三个地区的代表总数还多，使得特利腾大公会议完全成为教宗意愿的表示——只要是教宗提出的议案，基本都能得到支持而通过。

首先，特利腾大公会议谴责一切新教教派的教义，比如认为加尔文宗的预选论应该处以绝罚，在所有有争议的问题上重新确认和澄清天主教会的教义，包括重新肯定圣经的《武加大译本（即拉丁通俗译本）》为权威圣经版本。1551 年到 1553 年，教宗召集了一些新教教士来旁听会议和参加讨论，来向新教徒展示自己的立场。梅兰希通、布伦茨等人都曾在 1552 年到过特伦托。

第二，特利腾大公会议决定在教廷的管理模式和纪律上进行改革。首先是立法废止一些地方教会的特权，对赎罪券的销售，修士的道德准则和教育培养设立纪律检查制度，以及禁止决斗。要求教士必须前往驻在地任职，不能身兼数职。在这方面，教廷已经意识到部分教士的腐化堕落，并试图扭转这一局面。但教廷依然完全否认新教徒对完全消除教廷权威的观点。

第三，教会有圣经的解释权，天主教会的传统和圣经具有同等且独立的权威。所有基督徒必须承认教宗之地位，“因信称义”被裁定为异端。

第四，重新确认了因信成义的原则，以针对路德的“因信称义”。

第五，其他引起新教徒不满的天主教传统，例如朝圣、圣徒和遗物的崇拜以及圣母玛利亚的崇拜，都得到了强烈重申，但禁止滥用这些做法。对于赎罪券，特利腾大公会议提请废止，最终于 1567 年被正式废除。

尽管特利腾大公会议意识到天主教廷内部存在的矛盾，但坚持认为矛盾存在于组织上而非教义上。在教义上，教会采取完全闭关，不对任何对教义的攻击妥协，也不修改教理本身。

特利腾大公会议明确了教改运动中天主教会的立场，也为地方教会制定了行为准则，同时也明确了反宗教改革的基本策略，为之后推行反宗教改革以至宗教战争提供了策源。

## 禁书目录

为了对抗印刷术普及后一些被教廷认为会威胁其权威的书籍的传播，教廷在 1559 年首度发表了《禁书目录》。这个目录前后修订了 32 版，禁止条目总共达到了四千多条。这一目录直到 1966 年才被正式废除。

《禁书目录》包含了大量的现代科学发端的基础研究文献，也包括了很多现代人耳熟能详的作者，基本算是西方哲学、文学、法学和科学界的半壁江山，颇有一种“教廷优选”的感觉。尤其是到 18 世纪中期启蒙运动高涨时，那一批著名的法国启蒙大师如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达朗贝尔、卢梭等等几乎一个不



落，20 世纪的《禁书目录》里的作者还不乏亨利·柏格森这样的诺贝尔奖得主。  
wiki 上的精选的一部分禁书目录的英文列表的翻译如下，每条依次是禁止开始时间、作者和作品：

1600 年，布鲁诺，所有著作  
1626 年，胡果·德赫罗特，所有神学著作  
1645 年，托马斯·布朗，《一个医生的宗教》  
1649 年，托马斯·霍布斯，所有著作  
1657 年，1789 年，布莱兹·帕斯卡，《思想录》  
1659 年，约翰·加尔文，Judicial lexicon of imperial and canon law  
1663 年，勒内·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录》等等  
1667 年，格利高里·蕾蒂，所有著作  
1668 年，弗朗西斯·培根，De dignitate et augmentis scientiarum libri IX.  
Donec corrig.  
1676 年，迈克尔·德·蒙田，《随笔集》  
1679 年，1690 年，巴鲁赫·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  
1684 年，约翰内斯·斯科特·爱留根纳，De divisione naturae libri quinque diu desiderati  
1689 年，1707 年，1712 年，尼古拉斯·马勒伯朗士，Traité de la nature et de la grace 等等  
1694 年，1758 年，约翰·米尔顿，Literae pseudo-senatus anglicani, Cromwellii reliquorumque perduellium nomine ac iussu conscriptae 等等  
1703 年，让·德·拉封丹，Contes et nouvelles en vers  
1717 年，摩西·本·迈蒙，《和米什尼托拉谈偶像崇拜》  
1729 年，约瑟夫·艾迪逊，《对意大利部分地区的评论》  
1734 年，1737 年，约翰·洛克，《人类理解论》等等  
1738 年，艾曼纽尔·斯维登伯格，《原则》  
1742 年，乔治·伯克利，《阿尔西伏隆》  
1743 年，丹尼尔·迪福，《恶魔的政治史》  
1744 年，萨缪尔·理查德森，《帕梅拉》  
1751 年，1762 年，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论法的精神》  
1752 年，伏尔泰，包括《老实人》在内的 38 部作品  
1758 年，1804 年，丹尼·狄德罗，《百科全书》、《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  
1758 年，达朗贝尔，《百科全书》  
1759 年，1774 年，克洛德·阿德里安·爱尔维修，《论精神》、《论人》  
1761 年，大卫·休谟，所有著作  
1762 年，1766 年，1806 年，让-雅克·卢梭，《爱弥儿》、《社会契约论》、《新爱洛伊斯》  
1764 年，亚当·费伦茨·克雷斯特尼·科拉尔，De originibus et usu perpetuo potestatis legislatoriae circa sacra apostolicorum regum Ungariae  
1766 年，切萨雷·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  
1783 年，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  
1815 年，儒勒·米什莱，六本著作  
1817 年，伊拉斯谟·达尔文，《Zoonomia》

1819 年，劳伦斯·斯特恩，《穿越法国和意大利的感伤之旅》  
1827 年，尼古拉斯·德·孔多塞，《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  
1827 年，伊曼纽尔·康德，《纯粹理性批判》  
1828 年，司汤达，所有爱情小说  
1834 年，于格·费利西泰·罗贝尔·德拉梅内，七部作品  
1834 年，贾科莫·卡萨诺瓦，《Histoire de ma vie》  
1835 年，杰里米·边沁，《Deontology》及其它三部作品  
1836 年，海因里希·海涅，《游记》等三部作品  
1840 年，乔治·桑，所有爱情小说  
1841 年，巴尔扎克，所有爱情小说  
1849 年，文琴佐·吉奥贝蒂，所有著作  
1852 年，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所有著作  
1859 年，厄恩斯特·勒南，19 部作品  
1863 年，1880 年，小仲马，所有爱情小说，La question du divorce  
1863 年，大仲马，所有爱情小说  
1864 年，奥古斯特·孔德，《实证哲学教程》  
1864 年，古斯塔夫·福楼拜，《包法利夫人》，《萨朗波》  
1873 年，皮埃尔·拉鲁斯，《19 世纪百科全书》  
1876 年，约翰·威廉·德拉普，《科学宗教冲突史》  
1894 年，艾米莉·佐拉，所有著作  
1911 年，加布里埃尔·邓南遮，所有爱情小说，所有剧作以及其他三部作品  
1914 年，亨利·柏格森，《论意识材料的直接来源》、《物质与记忆》、  
《创化论》  
1914 年，莫里斯·梅特林克，所有著作  
1922 年，阿纳托尔·法朗士，所有著作  
1931 年，西奥多·亨德里克·范·德·维尔德，《Het volkomen huwelijk》  
1948 年，让-保罗·萨特，所有著作  
1952 年，安德烈·纪德，所有著作  
1952 年，阿尔贝托·莫拉维亚，所有著作  
1953 年，尼克斯·卡赞扎基斯，《基督最后的诱惑》  
1956 年，西蒙内·德·波伏娃，《第二性》、《名士风流》

不客气的说，这些书你要能都看完，知识水平那不知高到哪里去了，可能一般的文科本科生都未必打得过你，所以有时你不得不佩服教廷还是有高人。但是这个目录并不是教廷认为的“所有违背天主教道德的作品”，而是一些比较模糊的，可能受到天主教徒认可的但教廷不认可的作品。因为如尼采或者马克思的作品，天主教徒普遍不太接受，因为这些作品根本不用讨论就是明显违背教廷权威的，所以就不用列入禁书目录。同理，查尔斯·达尔文的作品也没有被列入过《禁书目录》，但是他爷爷伊拉斯谟·达尔文的作品却被列入了。

《禁书目录》虽然由教廷推广，理论上列入目录的书籍都要销毁，但是实际落实程度就取决于当地的统治当局对教廷的忠诚度。有的地方倾向于自己搞一份清单，比如法国；西班牙也有一份自己的清单，但就基本和教廷的目录一致了。早期一些地方有出版商因为出版了目录上的书籍被火刑，但到了 19 世纪-20 世纪，教廷已经基本丧失了政治权利，基本不会有人因为出版的书籍上了目录而受到实际意义的惩罚。但是这份清单还是到 1966 年才被撤销，但是教会依然声称



这个目录仍然有道德上力量——尽管现在教会已经缺乏强制手段来贯彻这个目录了。

## 欧洲各地的反宗教改革运动

教会在反宗教改革中的态度一直是原则性的，尽管也烧人，但是一般也是在所谓的“程序正义”的基础上烧人。而各地的天主教领主在自己领地推行反宗教改革时，路子就变得非常野——这时教义上的争端都是次要的：在一些可以分享教廷权威利益的贵族眼中，新教徒无异于是直接挑战领主的权威，那不仅是宗教问题，更是政治问题。而领主们解决政治问题的手段，在经历了中世纪数百年的锻炼后，无疑已经相当熟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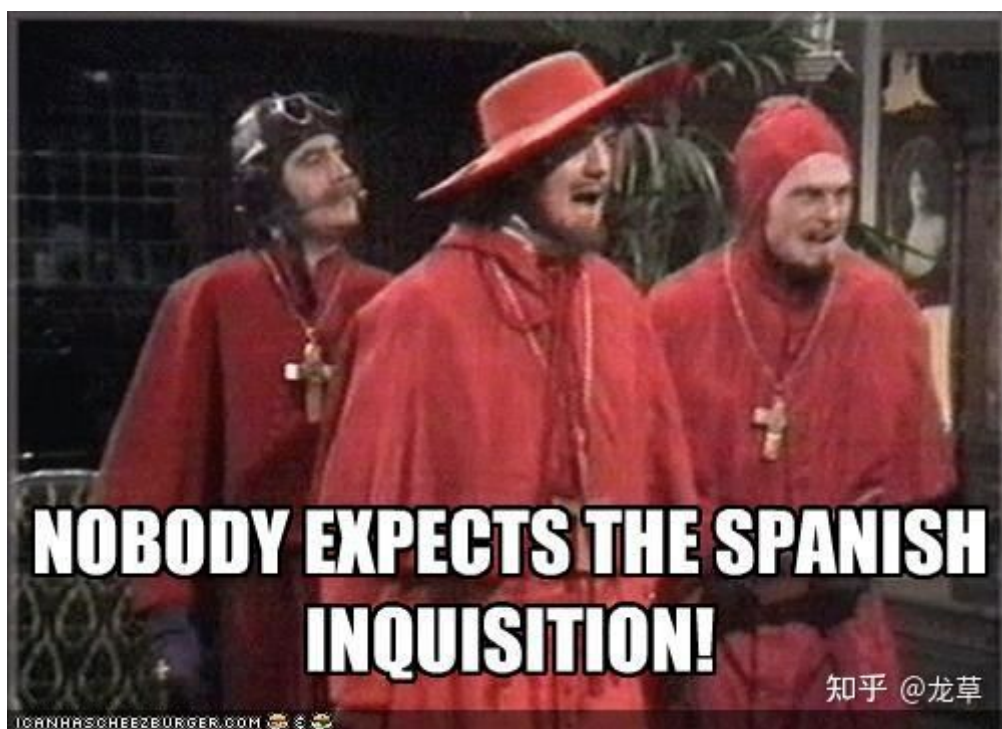
### 1. 英格兰的反宗教改革：玛丽一世

亨利八世冲冠一怒为红颜后，英格兰教会和罗马教廷的联络几乎中断。到了保禄三世时期，亨利八世被开除教籍。亨利八世对教会教义上的改革并不感兴趣，但他不能容忍教会无视他的权威，所以其改革主要是针对教廷的组织形式，要求教会必须服从国王，所以英格兰教改运动从一开始就是政治性压倒宗教性的。

1553 年，爱德华六世病逝。按照常理，其姐姐玛丽应当继承王位——但是玛丽是一位狂热的天主教徒，她的母亲是阿拉贡的凯瑟琳——亨利八世的第一任妻子，祖母是伊莎贝拉女王，祖父是阿拉贡的斐迪南，有着深厚的天主教家族传统。所以爱德华六世为避免天主教复辟，于是强行把王位传给了亨利八世的妹妹一支的新教徒简·格雷女爵。但是简·格雷女爵只当了九天女王，就被支持玛丽的军队击败，玛丽继位称玛丽一世。玛丽一世继位后，立即着手天主教复辟。玛丽一世继位时已经 37 岁，必须尽快结婚剩下继承人以免其妹妹，信奉新教的伊丽莎白获得高顺位继承权。所以玛丽一世选择了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也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儿子腓力二世，二人于 1554 年结婚。1556 年查理五世退位，腓力二世继位为西班牙国王，这使得玛丽一世拥有了一个极其强大且坚定的天主教外援。

玛丽一世拒绝其父亲亨利八世和爱德华六世时期的新教改革，一心复辟天主教，重新建立了和罗马教廷的联系，任命心腹列金诺·保罗为坎特伯雷大主教，处死了前任大主教。大量爱德华六世时期设立的新教相关法律被废除，只保留了少数亨利八世时期留下的法条。

玛丽一世对待新教徒领袖的手段非常有西班牙特色，主要就是烧人。到底烧了多少人实际上没有详细记录，但至少数百人。这可能也是为什么之后新教重新占上风后，英国的启蒙运动家经常批判西班牙异端审判庭——毕竟感同身受，甚至还有网络 meme。现在很多西班牙学者出于保护心理或者别的什么动机，也常认为异端审判庭的部分黑历史是英国人编出来的，Henry Kamen 在 1998 年出版过一本书《西班牙异端审判庭：历史的修正》来解释这一观点。[1]



### Nobody expects the Spanish Inquisition

但是玛丽一世的天主教复辟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其本人在位将近五年，1558年42岁的玛丽一世病逝，临死前也没留下子女，所以其王位传给了亨利八世的另一个女儿伊丽莎白，也就是都铎王朝最富盛名的“荣光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伊丽莎白一世在国内继续推动宗教改革，最终形成了所谓“伊丽莎白宗教立场”的一系列宗教政策，为英国教改运动画上了句号。

从结果来看，英国的反宗教改革运动失败了，但是英国的宗教改革运动也并不彻底。英国的教改运动自始至终是以政治因素为导向的，对天主教本身教义的反对并不多。所以英国教改运动留下的遗产，不是路德宗也不是加尔文宗，而是保留了大部分天主教礼仪但对天主教原有的等级结构和组织模式进行大改的圣公宗。这一结果使得英国国内的激进派改革运动支持者——主要是清教徒——非常不满，直接导致了1642年-1649年的英国内战；而另一批清教徒则选择背井离乡，搭上名叫五月花号的航船驶向新大陆，当1620年他们在一个叫普利茅斯的地方安顿下来时，历史也被永久的改变了。

## 2. 德意志地区的反宗教改革：施马尔卡尔登战争，奥格斯堡和约，科隆战争

1531年2月，北德意志最重要的两个新教邦国黑森伯国和萨克森宣帝侯国成立施马尔卡尔登联盟，以对抗查理五世。施马尔卡尔登联盟的加入规则是认同《奥格斯堡信条》和《四城信条》，基本认为就是路德宗的标准。但是很多德意志邦国都垂涎于脱离天主教会带来的经济利益，很快到1535年，安哈尔特、符腾堡、波美拉尼亚、奥格斯堡、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等邦国和帝国自由市都加入了联盟。施马尔卡尔登联盟的成立标志着新教势力第一次在政治和军事上足够和查理五世抗衡。

1546 年，施马尔卡尔登战争爆发，虽然联盟在军力上占优，但是因为领袖的个人能力问题，最终还是战败。1548 年，查理五世迫使联盟签署了《奥格斯堡临时敕令》，要求重新回归天主教。但是 1550 年前后，新教已经有了强大的社会基础，凭借单纯的军事威逼很难彻底改变北德意志新教化的事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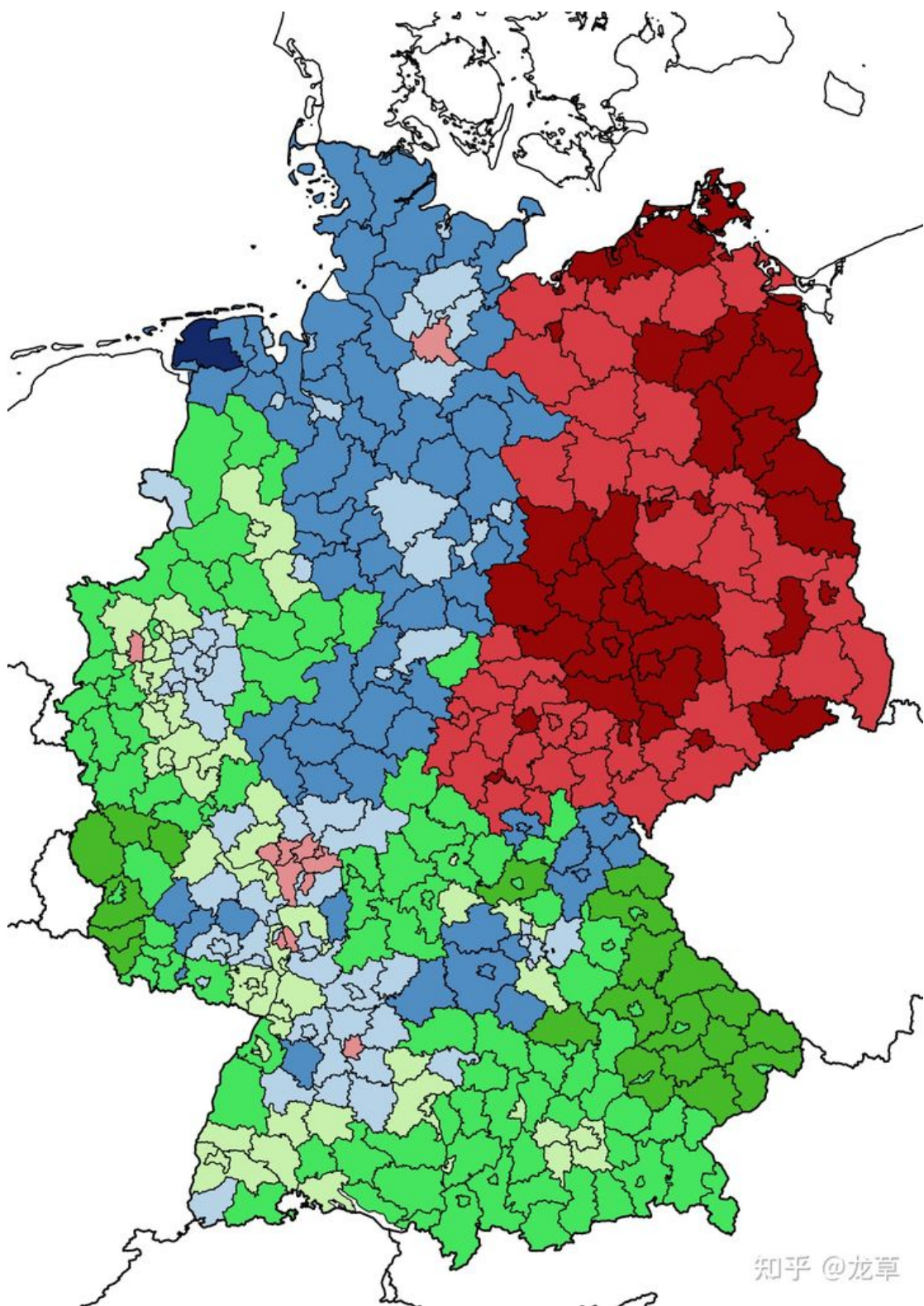
1552 年，萨克森选帝侯趁查理五世在北意大利和法国人打得不亦乐乎的时候向皇帝宣战，第二次施马尔卡尔登战争爆发。查理五世一开始就被击败，为了集中力量对付法国人，不得不和施马尔卡尔登联盟签署和约，三年之后的 1555 年签署了正式和约，也就是《奥格斯堡和约》。

《奥格斯堡和约》最重要的让步就是确认了“教随君定（*cuius regio, eius religio*）”原则。也就是德意志邦国的世俗君主可以决定自己臣民的宗教信仰，而民众必须服从。如果民众不愿意改信自己君主的宗教，那么可以变卖财产然后自己出境。

“教随君定”被认为是教廷缓和教俗矛盾的举措，且天主教集团做出了让步。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奥格斯堡和约》再次确认了普通民众没有自己选择信仰的权力，这导致了一个结果就是天主教集团只要影响一地的领主，就能遏制一个地区的新教传播。所以《奥格斯堡和约》本质上依然是一个“划分势力范围”的和约，而对当时燎原之势的新教来说，这个和约或许并不明智——因为直接中断了新教在哈布斯堡核心地区的传播，使得哈布斯堡王室能够更轻松地在自己统治的核心区推动反宗教改革。

“教随君定”原则只适用于世俗领地，而对原本就是教会的采邑，比如主教区、大主教区则适用“教会保留（*Reservatum ecclesiasticum*）”，如果大主教改宗新教，那就应该辞职。1582 年，科隆大主教格布哈特改宗新教，按原则应该辞职，但是其却在 1583 年结婚，并试图将科隆变成一个世俗领地——如普鲁士大公故事。教廷当然是不允许的，于是派了另一个大主教巴伐利亚的恩斯特去接任。于是科隆战争爆发。不巧的是格布哈特信封加尔文宗，所以很难从大多信奉路德宗的北德意志新教领主尤其是萨克森获得支持。最终恩斯特的军队获得了胜利，格布哈特被驱逐。科隆战争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莱茵兰的新教化，尤其恩斯特大肆引进耶稣会士在莱茵兰地区推行反宗教改革；西班牙也因此获得了北德意志的重要桥头堡，牵制尼德兰的新教运动，同时也防止法国人向莱茵兰渗透。

但总的来看，德意志核心地区的反宗教改革并不算特别成功，只能说是用一系列小规模冲突是延后了爆发大规模决定性宗教冲突的时间。最终德意志北部地区的新教化趋势还是无法扭转，但莱茵兰地区的新教化一定程度上被抑制了。至今，德国的天主教徒主要分布的范围就是南德和莱茵兰。



2011 年调查中德国的宗教分布情况：蓝色指新教主导，绿色指天主教主导，红色指无宗教或不明确者主导

### 3. 哈布斯堡核心领地的反宗教改革

相比北德的力不从心，哈布斯堡核心领地：奥地利、波西米亚和大匈牙利的反宗教改革则是天主教大获全胜。16 世纪教改运动中，哈布斯堡核心领地大面



积新教化，除了蒂罗尔之外的奥地利受路德宗的影响；匈牙利则成为了东欧加尔文宗的传播中心；波西米亚自古以来就是宗教改革的策源，胡斯派和摩拉维亚弟兄会依然有很大的影响力。尤其是特兰西瓦尼亚那边的奥斯曼人不强迫领地的人改宗，使得当时哈布斯堡和奥斯曼帝国的边境成为东南欧新教运动的发展中心，德布勒森一度号称加尔文宗的罗马。加上法国人一直试图连结波兰和匈牙利反哈布斯堡力量，所以教改运动时代的哈布斯堡王室可谓四面楚歌。

鲁道夫二世从 1576 年开始残酷镇压新教徒，但是直到 16 世纪结束，收效都并不大。当时波西米亚新教的发展已经刹不住车了——新教徒控制了布拉格大学，完全掌握了教士和精英阶层的培养，天主教会几乎无法在教育上与新教徒抗衡。哈布斯堡王室的应对手段就是派遣耶稣会士，同样通过建立学校和教育机构与新教徒分庭抗礼，比如奥洛穆茨大学，后来改名为帕拉茨基大学。布拉格大学（布拉格查理大学）和帕拉茨基大学现在依然是捷克的知名学府，前者培养出了诺贝尔奖得主海洛夫斯基和科里夫妇，后者培养出了遗传学家兼天主教神父孟德尔。

这种对抗在 1618 年进入了白热化，直接引发了掷出窗外事件。但是作为三十年战争的发源地，波西米亚并没有在战争后继续保持自己的新教信仰——哪怕三十年战争的结果名义上是新教联盟胜利了。白山战役中捷克新教军队遭到惨败，哈布斯堡王室聘请的雇佣军在蒂利伯爵的率领下开进布拉格，然后立即对新教教士和贵族进行了屠杀。1621 年，在三十年战争初期势如破竹的皇帝颁布敕令：任何加尔文宗教徒和路德宗之外的新教徒必须在三天内离开帝国领土，到 1622 年敕令又宣布路德宗也要离开。1627 年，布拉格大主教举办转信仪式，大波西米亚的核心地区几乎迅速的回归天主教，新教徒被迫逃亡西里西亚、摩拉维亚和斯洛伐克，继续武装斗争。三十年战争的泥潭严重摧残了波西米亚的经济，波西米亚的村庄数量在战争结束时只剩下了三分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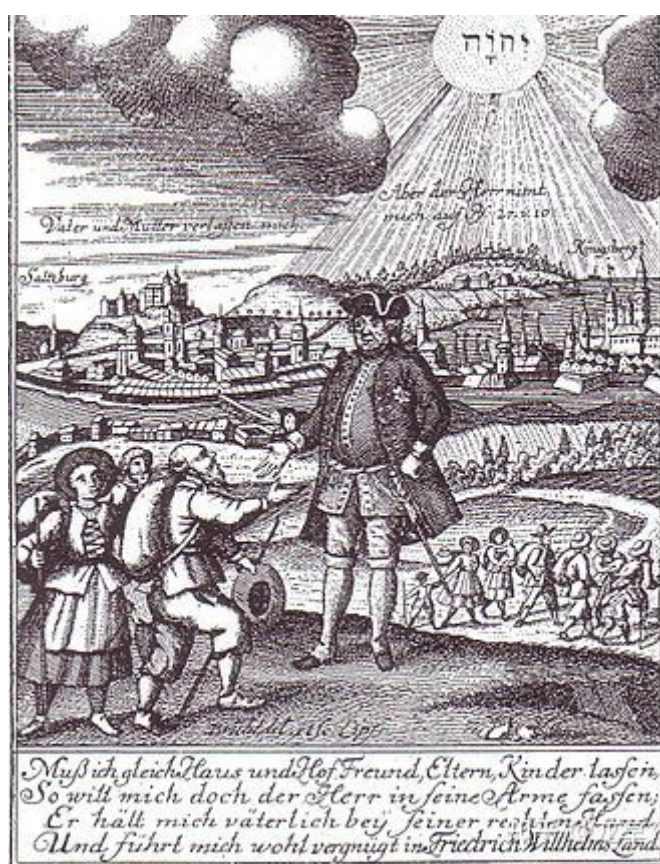
彻底平定波西米亚后，天主教军队趁胜追击：西班牙军队兵进尼德兰和莱茵兰-普法尔茨，迫使北德意志新教邦国和丹麦下场，三十年战争自此一发不可收拾。

尽管《威斯特伐利亚和约》重新确认了《奥格斯堡和约》，确保了帝国境内领主自由改信路德宗和加尔文宗的权力，但是对于其他较小的新教派别则没有明确。1655 年，萨伏伊公爵对瓦勒度派信徒搞大屠杀，克伦威尔扬言要派舰队去帮助瓦勒度派，但最终还是作罢；瑞士、荷兰和瑞典也就是谴责一下，宣布接纳瓦勒度派难民，实际上也没有别的政治和外交行动。同时，哈布斯堡在自己统治的核心领土上迫害新教徒，外国的干涉也很难有什么效果。

最重要的标志是萨尔茨堡新教难民事件。1684 年，萨尔茨堡大主教宣布要驱逐居住在德弗雷根山区的新教徒，并要求他们立即离开，但是要把自己 15 岁以下的孩子交给天主教会教育——离开的父母还要给天主教会缴纳学费。这遭到了部分新教邦国和团体的强烈抗议，认为这是公然挑战《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和《奥格斯堡和约》。但是萨尔茨堡大主教辩解道这批被驱逐的人不是真正的新教徒，不能享受新教徒的权力。五年后，皇帝利奥波德一世干涉了这个决定，允许这些留下来的小孩自己选择是否回到父母身边——但是五年已经过去了，最终只有很少的几个孩子愿意回到父母家中。

到几十年后的 1731 年，大主教利奥波德·安东·冯·菲尔米安大笔一挥，决定驱逐所有萨尔茨堡主教区的新教徒。驱逐令发布日甚至特意选在了《九十五条论

纲》发布纪念日的 10 月 31 日。这次驱逐令和德弗雷根驱逐类似，新教徒被要求八天内离开萨尔茨堡，留下 12 岁以下的孩子——这是明显挑战《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表现。在遭到一些抗议后，驱逐令被改成新教徒可以留在萨尔茨堡直到 1732 年 4 月，其财产可以保留三年。1731 年 11 月，一批新教团体前往柏林游说勃兰登堡-普鲁士以获取声援，普鲁士认可了萨尔茨堡主教区的新教徒是路德宗，所以理应受《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保护。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在 1732 年宣布保护萨尔茨堡新教徒，并支持他们迁徙到普鲁士东部。迁徙到普鲁士东部的萨尔茨堡新教徒可以得到免费的土地和一定量的补给，以及一定时间的免税权——当然也不是完全因为好心，而是这一地区刚刚经历了自然灾害，人口减少，同时该地的门诺派信徒一直不愿服兵役，于是腓特烈·威廉一世驱逐了当地的门诺派，把萨尔茨堡的路德宗教徒接来殖民。最终的结果是大约 20000 人从萨尔茨堡迁徙到东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亲自迎接了第一批移民。



描述腓特烈·威廉一世迎接萨尔茨堡新教徒移民的绘画

三十年战争后，匈牙利爆发反哈布斯堡的起义，起义者的主体就是加尔文宗教徒，并且背后有波兰、法国和奥斯曼的支持。到 17 世纪晚期，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退，哈布斯堡王室收复了大匈牙利，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更加严苛的反宗教改革，新教徒的社会地位一直无法获得承认。这种情况持续到 1731 年《卡罗莱纳决议》后才有所改观。在教改运动时代，匈牙利的加尔文宗教徒一度占到总人口的 75% 以上，但是到一战前夕，新教徒的比例只剩下原本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少。哈布斯堡推动的反宗教改革功不可没。

哈布斯堡官方上的反宗教改革政策直到 1781 年《宽容诏书》的颁布才正式结束——但这已经不重要了。宗教上哈布斯堡已经基本完成了内部的宗教统一，甚至还有余裕，但是这也不重要了——因为到 18 世纪末，宗教的意义早就不是



16 世纪或者更早的中世纪那样了。很快哈布斯堡王室就要面临一个比宗教更难对付的新意识形态，这个意识形态最终肢解了叱咤风云数个世纪的哈布斯堡帝国，这就是民族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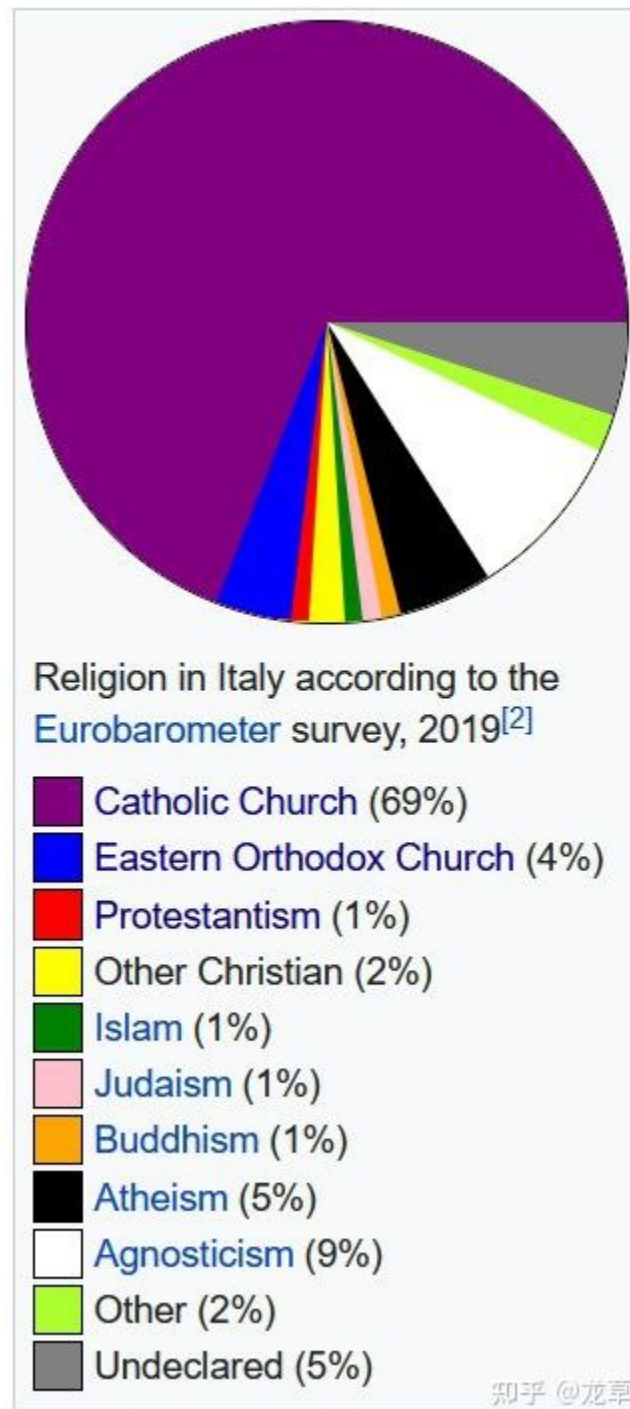
#### 4. 意大利的反宗教改革

另一个反宗教改革大获全胜的地区就是意大利。北意大利本身工商业发达，经济上似乎是教改运动的温床；北意大利同时也是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的发源地，文化上也有进步的动力；但同时，北意大利也是教廷统治的核心地区，能够很容易的分享教廷权威带来的利益，甚至意大利由于过于靠近罗马，已经提前对天主教徒产生了祛魅的效果，意大利城邦对天主教的忠诚是建立在利益上而非信仰上，所以发端自宗教争论的教改运动自一开始在意大利就举步维艰。

但并不是说完全就没有希望。1520 年代，一些激进的意大利教士就已经开始传阅路德的作品，但由于语言问题，路德的德语作品在意大利的影响力一直很有限。宗教迫害使坚持新教信仰的意大利教士迅速极端化，开始传播更激进的加尔文宗、再洗礼派甚至非三位一体主义的理论。一些邦国的政治家也经常和这些激进教士厮混，邀请这些人为座上宾。但在民间这些激进新教徒的影响一直很有限。

1542 年罗马异端审判庭开张之后，意大利的新教团体迅速崩溃。因为意大利新教一直是在精英阶层小范围传播，所以被打击时几乎没有抵抗力——原本将这些新教教士视为座上宾的政客在面临异端审判庭时，也很知趣的出卖了这些教士来保障自己的既得利益。北德意志宗教改革的动力是教廷垄断了教权，而在意大利由于近水楼台，平信徒本身就有相比北德意志更多的机会参与到宗教生活中，所以对所谓“教廷垄断”的感知并不强。很快，意大利的新教教士们就逃亡欧洲各地，比如北欧、东欧，成为了这些地区的宗教改革推动者。一个哭笑不得的事情是，1603 年第一本意大利语《圣经出版》，在意大利没有多少反响，却意外的促进了瑞士的讲意大利语的地区的新教发展。

到 17 世纪初，意大利的新教就基本不存在了。只有源自中世纪的早期改革教会瓦勒度派依然以小团体的形式存在。但是到 1655 年，瓦勒度派在萨伏伊遭到了血腥屠杀，一些新教国家宣布接纳瓦勒度派信徒，意大利的瓦勒度派教徒也纷纷出国避难。时至今日，意大利依然是一个天主教占绝对多数的国家，新教甚至比 other 基督教还少。



Eurobarometer2019 年调查中意大利的宗教人口比例情况

## 5. 法国的反宗教改革：法国宗教战争

法国作为天主教和新教争夺的焦点国家，其宗教冲突也最为血腥——仅仅“名垂青史”的大规模屠杀就有两次：1545 年美林多尔针对瓦勒度派的大屠杀和 1572 年著名的圣巴托洛缪日大屠杀。法国宗教战争从 1562 年到 1598 年持续了 36 年，胡格诺派和天主教势力反复拉锯，互相屠杀，将近 300 万人在战争中死去。最后的结果是两败俱伤：笑到最后的是亨利四世虽然原本是胡格诺派，但也不得不改宗天主教。1598 年亨利四世签署《南特敕令》，确认胡格诺派的信仰自由

和平等地位。如果故事就在这里结束，那么法国会成为当时西欧罕见的宗教宽容国家，和东欧的波兰遥相呼应（尽管《南特敕令》并没有《华沙联盟条约》那么自由）——但是可惜的是故事在这里并没有结束。

《南特敕令》尽管保障了新教徒的平等地位和信仰自由，但是天主教依然是国教，而且天主教势力在法国依然有强大的影响力。三十年战争时期，法国敏锐的外交策略同时削弱了哈布斯堡王室和北德意志新教邦国，让法国成为三十年战争的最大赢家；但你要说黎塞留不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这也是不对的——黎塞留对内镇压新教徒的手腕同样非常强硬。三十年战争的结果与其说是“新教徒联军”赢了，不如说是哈布斯堡王室和新教徒联军两败俱伤，法国成为欧陆霸主，直接将德国统一推迟了二百多年。

法国国内强大的天主教势力最终的结果就是路易十四。路易十四的爷爷亨利四世是一个从胡格诺派改宗天主教的国王，而路易十四则是一个完全的天主教徒——1685年《枫丹白露敕令》结束了法国法律上的宗教宽容，胡格诺派被宣布非法。大批胡格诺派信徒被迫离开法国，前往周边新教国家甚至新大陆。

我们事后很难说路易十四的《枫丹白露敕令》是出于对天主教的虔诚还是单纯出于集权考量，或者二者兼有。因为法国的反宗教改革一直有一个独特的点，就是这些改革并不是教廷指导下做出的——法国教会一直有着高度的独立性，并且对罗马教廷的权威也不太看重。法国的反宗教改革并不是罗马教廷反宗教改革的一部分，而是法国王室根据本国情况和自身利益自发组织和实施的，也根本没有打算和罗马教廷的反宗教改革运动配合。

法国的例子说明，“宗教自由”并不是一纸诏令就能实现的东西。生产关系不能强行超越生产力，政策也不能完全脱离法国的基本社会文化和经济状况。《南特敕令》尽管看起来比较美好，还有法国国王背书，但是最终的结果还是被《枫丹白露敕令》取代。

对法国反宗教改革运动的成果评价就比较复杂。从保持天主教主体地位的角度来说，它成功了；但是从确保罗马教廷的权威来说，那种东西自始至终就没有真正存在过，所以也就谈不上“确保”了。

## 6. 波兰的反宗教改革

波兰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天主教国家。其自中世纪盛期开始就有着长久的宗教宽容传统，教改运动时期更是很早就承认了路德宗的合法地位。然而波兰的反宗教改革却最终获得了胜利——波兰在17世纪之后成为了一个天主教占绝对主导的国家。

尽管波兰官方一直保持着宗教宽容政策，但是一些天主教教士在教改运动时期依然对新教持敌视的态度。1555年波兰教会成立了定期的教皇使团，加深了波兰教会和罗马教廷的联系。1564年耶稣会士开始进入波兰传教，1577年皮奥特科夫公会议接受了特利腾大公会议的结论，波兰反宗教改革正式开始。

我个人觉得把波兰反宗教改革的锅完全扣给齐格蒙特三世是有点不公平的。波兰天主教会一直有一股势力，极力试图消除一切新教影响，比如16世纪早期的格涅兹诺大主教扬·拉斯基，比如克拉科夫大主教皮奥特尔·托米奇。只是波兰地方贵族分权传统极其强大，这些反宗教改革的支持者很难让自己的动议变成全国性的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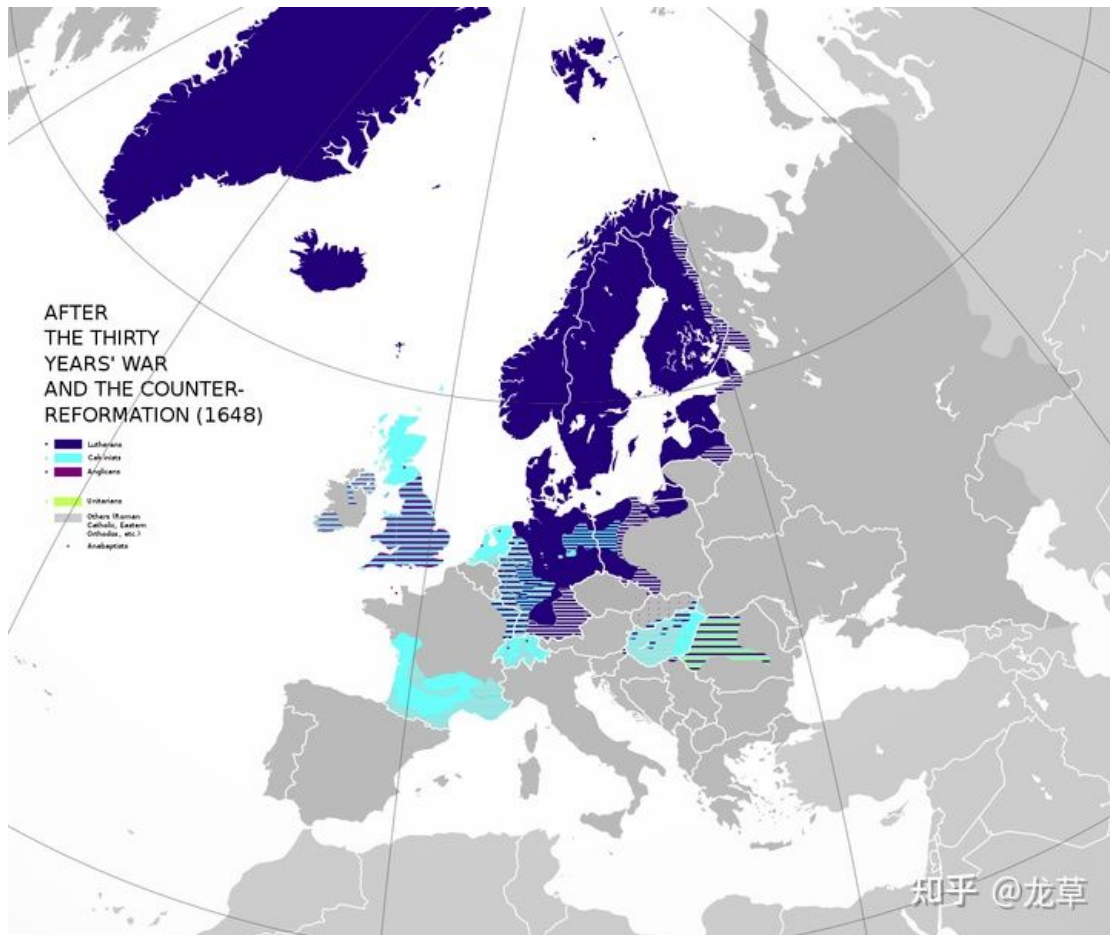
所以波兰的反宗教改革呈现的一个特点就是“文明”。一些支持反宗教改革的教士会去游说各大贵族，试图让他们支持自己的主张。并且广泛开设耶稣会学校，吸纳年轻的贵族子弟前来学习。1595 年布列斯特联合让一部分波兰东正教徒重新受波兰天主教会的节制，这次联合极大的提升了波兰天主教会的声誉。

17 世纪初开始，反宗教改革进入了新的阶段——因为经过了前一段时间潜移默化“文明”游说，波兰新教的土壤已经越来越贫瘠。于是反宗教改革的势力就开始利用政治手段限制新教徒的活动，比如引入《禁书目录》，一部分新教教派被禁止。自 1632 年开始，波兰禁止建设一切非天主教教堂。1658 年，激进的一位论教派波兰弟兄会被驱逐。1668 年，瑟姆宣布天主教徒改信其他宗教是非法。1673 年，非天主教徒被禁止加封为贵族。到 18 世纪，新教徒被禁止担任大多数民事职务，也被禁止参加瑟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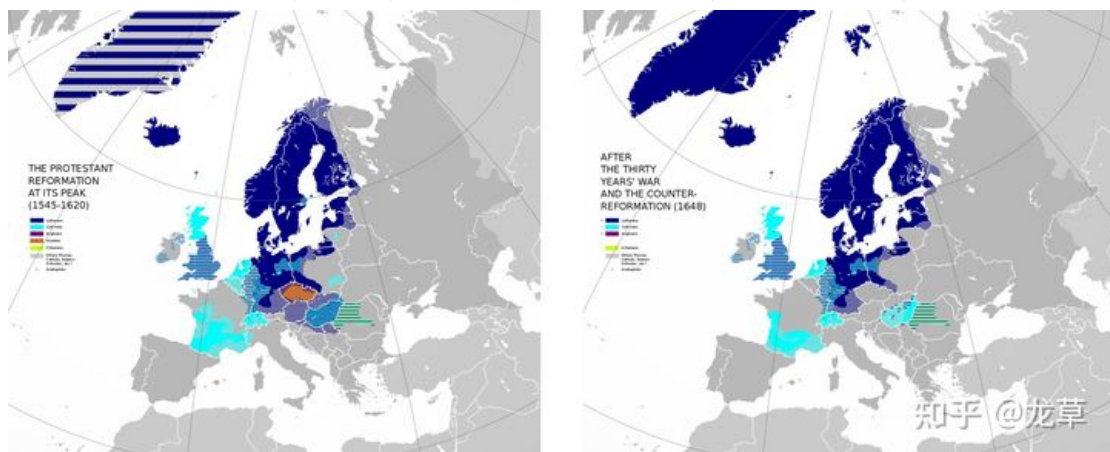
波兰的反宗教改革循序渐进，相对温和。尽管也出现了相互的仇杀和镇压，但是相对西欧来说，那简直不知道文明到哪里去了。所以波兰也被称为“无火刑国家”。波兰的反宗教改革持续了一百多年，从一开始的游说，到逐渐收紧的政策，再到最后的弹压，波兰天主教最终获得了极其崇高的地位，以至于和民族主义绑定，成为现代波兰人或者波兰文化的组成部分。

## 反宗教改革的总体成果

如果我们从结果来看反宗教改革，那必须要说，其成果相当可观。对比下面这张图和“天主教的危机和教改运动的发展”那一节的图，你就会发现，新教和天主教对欧洲中部的争夺，基本上是以天主教完全胜利而结束的：大匈牙利周边的新教影响基本被肃清，大匈牙利本土的新教也几乎十不存一，奥地利本土、北意大利的路德宗和加尔文宗被基本清除，这保障了哈布斯堡王室的核心利益；低地则一分为二，尼德兰改宗加尔文宗，比利时则保持天主教；法国中部的加尔文宗也被基本肃清，新教在法国核心地区的影响力基本消失，只剩下南部乡村地区还保留有一定影响力；波西米亚作为新教策源，两次重大的宗教战争的爆发地，最终在白山战役后新教力量也被基本肃清。最终，整个欧洲彻底新教化的国家和地区，包括瑞典、挪威、丹麦、北德意志、莱茵兰、尼德兰、英格兰、苏格兰和瑞士；而法国、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时、整个意大利、波兰和大匈牙利基本保持了天主教信仰的主导地位。如果计算人口，那么毫无疑问天主教依然相对新教有比较大的优势；哪怕时至今日，欧洲天主教信徒的人数也要远超新教教徒。



1648 年三十年战争结束后天主教世界的新教化分布



两幅图的对比：左边是 1545-1620 年天主教世界新教化的分布，右边则是三十年战争结束时 1648 年的分布

按照 Euromometer 在 2019 年的调查，受访者自认为天主教徒的欧盟国家公民占总受访者人数的 41%，而新教徒则占 9%，相对的，东正教徒仍然占 10%。[2]而根据皮尤 2011 年对整个欧洲基督徒的宗教背景调查，天主教徒占 46.3%，东正教徒占 35.4%，新教徒占 17.8%，新教徒依然处于相对弱势地位。[3]对新教徒来说，幸运的是在新大陆站稳了脚跟，所以从世界范围来看，新教徒人口差不多是天主教的 60-70%。



Europarometer 在 2019 年对欧盟国家公民的宗教信仰调查分布

### Size of Christian Traditions in Europe

Tradition	ESTIMATED 2010 CHRISTIAN POPULATION	PERCENTAGE OF REGION'S CHRISTIAN POPULATION
Catholic	261,660,000	46.3%
Orthodox	200,160,000	35.4
Protestant	100,640,000	17.8
Other Christian	3,100,000	0.5
<b>Total Christian</b>	<b>565,560,000</b>	<b>100.0</b>

Population estimates are rounded to the ten thousands.  
Percentages are calculated from unrounded numbers.  
Figures may not add exactly due to rounding.

Pew Research Center's Forum on Religion & Public Life  
Global Christianity, December 2011

知乎 @龙草

### 皮尤 2011 年对欧洲基督徒的教派分布调查

但还是要明确一点，这样的成果，不仅仅是天主教会改革的功劳，还有欧洲领主对异教徒的镇压和战争的影响。三十年战争作为一场宗教战争开始，但是结束时却很难说这场战争在“宗教上”有什么特别大的意义，毕竟这里面有天主教国



家法国参加新教联军，也有丹麦等几个新教国家反复横跳。尤其是 1635 年第一阶段结束后，一批新教德意志邦国也开始支持皇帝对抗法国人了。可以说三十年战争发展到中期，宗教战争的影子就没了，反而带有后来民族国家战争的色彩。

作为宗教战争爆发的三十年战争最终对欧洲局势的影响却在政治上更加深远——或者说其政治上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其宗教上的影响。所以三十年战争作为一场宗教战争爆发，却并没有作为一场宗教战争结束。《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更像是新教联军和哈布斯堡划定势力范围的条约。三十年战争的最大赢家就是法国，虽然它一开始支持新教联军，但他也是天主教国家，所以三十年战争新教赢了吗？事实是在此之后，除了战争开始时原本就是新教的地区，再没有一个欧洲天主教国家继续变成新教占主导，反而是匈牙利的新教化被遏制和扭转，而北德意志新教阵营的领袖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特三世为了当波兰国王改宗天主教——可以说，到瑞典在大北方战争被打残后，直到普鲁士崛起前，除了孤悬海外的英国，欧洲大陆上没有一个新教国家能够称得上是强权。那么天主教赢了吗？也不然。三十年战争后虽然天主教在反宗教改革中获得了成功，但是欧洲的历史车轮已经滚滚向前，民族主义开始觉醒。争夺信教人口逐渐变得没有意义，基于教会-世俗纽带的传统封建秩序土崩瓦解——很快罗马教廷就从天主教世界的明珠逐渐变成相对次要的存在。教改运动带来的人文主义和启蒙精神最终渗透进了无论是新教还是天主教世界的各个角落。最终，1870 年艾曼纽尔二世兵进罗马，永恒之城重归世俗。

法国在三十年战争中的外交抉择在我看来非常毒辣——法国在三十年战争前刚刚经历了长达 36 年的法国宗教战争，最终天主教势力勉强获胜；但到路易十三时期，法国的天主教意识越来越强化，路易十三开始镇压国内新教胡格诺派。但外交上路易十三却选择支持新教联盟，但是第一阶段又不主动出击，相当于在神圣罗马帝国复制了一场法国宗教战争；等到新教联盟被哈布斯堡打得半死，法国在 1635 年正式出兵，不仅直接消解了哈布斯堡的皇室对德意志地区的控制，同时也保证新教联盟再也没有能力发动反扑。就很有意思，虽然法国三十年战争中支持新教联军，但是在三十年战争结束后，法国国内的新教徒的影响力反而被严重削弱了，并且在之后的数十年里被进一步压制。这种选择一是解决了哈布斯堡政治上对法国的威胁，同时也解决了北德意志新教地区在宗教上对法国天主教的威胁，可谓双赢——很多人后来分析法国在三十年战争中的决策时，往往只分析到第一个赢，而第二个赢经常被忽视。

当然法国唯一没有照顾到的变数就是普鲁士，那就不是本文的话题了。

## 参考

1. [^https://archive.org/details/spanishinquisiti00henr](https://archive.org/details/spanishinquisiti00henr)
2. [^https://europa.eu/eurobarometer/surveys/detail/2251](https://europa.eu/eurobarometer/surveys/detail/2251)
3. [^https://www.pewforum.org/2011/12/19/global-christianity-regions/](https://www.pewforum.org/2011/12/19/global-christianity-regions/)

文章来源：<https://zhuanlan.zhihu.com/p/381525254>